

派別、史實與文革異端思潮

● 宋永毅

讀罷大陸學者雲林先生與拙作、拙文商榷的〈文革異端的判別標準〉(以下簡稱雲文)^①，首先令我不無遺憾的是，雲林先生在駁斥「宋氏異端說」時抽去了主詞「思潮」，卻把形容詞「異端」按他的「形式邏輯」延伸為包括任何上層權力鬥爭中的反對派——從劉、鄧、陶諸老帥到林彪、陳伯達——的另一概念。而拙著所界定的「異端思潮」則是一種孕生流衍於民間的、「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中央文革及各級革委會公開批判過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動思潮」^②。其次，我對雲文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以及與文革「異端思潮」相關的基本歷史事實上更有不敢苟同之處，因而寫下這篇「批評回應」與他作較深入的商討。

造反派、保守派與異端思潮

令人微微一驚的是：雲文對文革中「異端思潮」與正統思想的劃分，仍滯留於三十餘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別立場。按雲先生的詮釋^③：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文革，其正統派是以守護無產階級專政為基點，以「十七年」舊體制為依憑，以「地富反壞右」傳統階級敵人為打擊對象的保守派，它不僅包括「血統論」的紅衛兵、「聯動」與文革初期公開的「保皇派」，而且還包括「一月革命」「保皇派」瓦解之後依托某一穩健造反派匯聚為合法革命組織的「新保守派」，如招納了部分老紅衛兵的北京中學生的「四·四派」，……異端派則是以「繼續革命」為大旗，反「十七年」舊體制，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革命對象的造反派，其典型代表是反抗「西糾」、「聯動」的「四·三派」、「出身論」、湖南「省無聯」、川大「八·二六」等激進反體制派。

且不論這種分析在理論上的偏誤，即使就史實而論，它都喪失了歷史研究對其客觀真實性的起碼要求。

其一，文革中的保守派或「新保守派」是否只以「『地富反壞右』傳統階級敵人」為「打擊對象」？反之，造反派又是否只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令我不無遺憾的是，雲林先生在駁斥「宋氏異端說」時抽去了主詞「思潮」，卻把形容詞「異端」按他的「形式邏輯」延伸為包括任何上層權力鬥爭中的反對派的另一概念。令人微微一驚的是：雲文對文革中「異端思潮」與正統思想的劃分，仍滯留於三十餘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別立場。

雲林先生的「派別分析」無視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在其誕生之初便不僅受到保守派的圍剿，也同樣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有時，來自造反派的批判往往更為激烈。而這種思考的超派別性，正是異端思想者們某種自覺非自覺的寶貴追求。



為革命對象」？只要稍有歷史常識，便可發見這一論斷與史實不符。運動初期風行北京的老紅衛兵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只不過他們大都以更正統的立場去造「正統」的反罷了。被他們揪鬥的「黑幫」，上自「三家村」、彭、陸、羅、楊，下到被他們殘暴地打死的校長和支部書記們，恐怕不是「傳統階級敵人」，只不過是已被宣判的「死老虎」或黨內的級別稍低罷了。被雲林先生稱為「新保守派」的諸派別——無論首都中學的「四四派」還是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派」——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鄧的批判亦從來不遺餘力。此外，文革中的造反派對「傳統階級敵人」也從不見得手軟。只不過他們崛起於反對走資派和工作組的「批判資反路線」的高潮之中，主要的鬥爭對象有其階段性的偏重罷了。

其二，雲林先生的「派別分析」無視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文革中的異端

思潮在其誕生之初便不僅受到保守派的圍剿，也同樣受到造反派的批判。有時，來自造反派的批判往往更為激烈。而這種思考的超派別性，正是異端思想者們某種自覺非自覺的寶貴追求。〈出身論〉初稿成於1966年7月，當時文革中大規模的派別鬥爭尚未形成。在它流傳於民間的1966年底，正是派別鬥爭方興未艾之際。但遇羅克卻為自己起了一個「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的筆名。他在回答關於這一筆名的起源時說：「我不喜歡甚麼戰鬥隊之類浮而不實的名字。我希望這筆名能啟發億萬家庭，希望每個家庭都能認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問題。」^④由此可見，遇羅克一開始就設法使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受膚淺的派別干擾。〈出身論〉刊出後，不僅受到血統論的維護者「聯動」等的衝砸、「四四派」的咒罵，也同樣受到過來自「四三派」和當時響鑼鑼的造反派「首都三司」的批

判。蒯大富就在不同場合罵過〈出身論〉好幾次，並切斷過《中學文革報》的印刷紙供應。為此，遇羅克曾憤而下過與蒯公開辯論的「戰表」^⑤。

文革中另一篇異端思潮的傑出代表作——李一哲的〈民主與法制〉也有過同樣的遭遇。儘管文章的三個年輕作者都是廣東「紅旗派」的革命造反紅衛兵出身，但他們關於「民主與法制」的獨立思考卻遭到了號稱激進的「紅旗派」眾多造反派頭頭的激烈批判。日處百萬之眾圍剿中的李一哲們，在扼腕痛惜之餘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想法^⑥：

最典型、最忠誠、最堅決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頑固、最反動的保皇派。他們造反，要保衛的就是「布爾什維斯大林—毛澤東」專制制度。他們和宣集文一樣，敏感地發現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們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

縱觀文革的全過程，只要不是至今仍固執於當年的某派立場而一葉障目，便不難清楚地看到文革中的異端思想者從來就是少數，他們的優秀代表作更從來就代表着一種超派別的獨立思考。一個顯而易見的史實是：文革中的多數的造反派在運動中只注重打倒某些具體的走資派，並設法使自己或自己這一派取而代之。在奪取權力後，造反派頭頭們又大都迷戀於權力本身，很快成為新官僚階級中的「暴發戶」。他們從來沒有挑戰過毛澤東的正統地位和共產黨的專制制度，而只是設法使自己成為毛澤東所建立的更專制的專制制度中的一員。而那些優秀的異端思想者們，一開始便只注目於如何推翻整個特權階級，改造整個權力機構，或進而用民主與法制來

確保人民的平等權利。把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都說成是「反體制」的「異端派」，其實是對造反派的一種人為美化，從而不負責任地按當年狹隘的派別利益把複雜的歷史簡單化了。

伊林·滌西對楊曦光； 聯動對朱成昭

循雲林先生的思路，把上述兩組人物放在一起並研究他們思想的同一性乃至某種超派別的傳承性，無疑又是一種「冰炭同器」的「學理邏輯上的混亂」^⑦。因為寫作〈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伊林·滌西，一向被認為是「保守派」掀起的「十一月黑風的第一個黑子彈」^⑧；而寫作〈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則是最激進的造反派——湖南省無聯的思想家。聯動是在「批判資反路線」中和造反派，尤其是首都三司極端對立的高幹子女組織；而朱成昭卻正是被聯動多次衝砸，揚言「砸爛」的首都三司的「司令」。然而，歷史並不是書齋裏的學理，對於風詭雲譎的文化大革命來說，超越常理的矛盾其實正是它蘊含真諦的某種複雜表現形式。

1966年11月15日張貼於清華園的〈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不僅在文革史上第一次正面挑戰了林彪製造的個人迷信，還第一次公開提出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組織形式需極大的改變。十七年來，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陳舊，極需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特點的，世界上從來沒有的國家機器」^⑨。這一提法比雲文提及的1967年第3期《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提法要早得

1966年11月15日伊林·滌西張貼於清華園的〈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不僅在文革史上第一次正面挑戰了林彪製造的個人迷信，還第一次公開提出了「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革新社會主義制度」。1968年1月6日，由楊曦光執筆的〈中國向何處去？〉對這一思想作了更為系統具體的發揮。兩者在思潮上有形無形的承傳性還是有迹可尋的。

雲林先生竭力否認聯動思潮是異端。不錯，聯動思潮中的血統論部分並沒有甚麼正面的歷史價值，但它對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文革如「斯大林時期大瘋狂」的批判，對中共上層權力鬥爭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取消一切專制制度」的吶喊等，卻不能因此連同洗澡水一起潑到垃圾堆裏去。

多，比毛澤東在運動初期關於「巴黎公社」的許諾也更完整、更激進。耐人尋味的是，這篇「保守派」「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作據說曾被北師大造反派的「新思潮」思想家「李文博所修改」。如果聯想到李文博等人早在1966年10月17日就喊出了完全相同的「大大改善無產階級專政，大大革新社會主義制度」的口號，這一有形的思潮上的傳承還是極為可信的^⑩。

1968年1月6日，由楊曦光執筆的〈中國向何處去？〉對這一思想作了更為系統具體的發揮。在「砸爛舊的國家機器」的總論下，他已廣泛地涉獵了「奪取軍權」、「重新建黨」等一系列如何砸爛的具體步驟^⑪。楊曦光後來在回憶他的寫作過程時，也提到了他在北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所受到的「批判現存國家機器」的思想的影響^⑫，兩者在思潮上有形無形的傳承性還是有迹可尋的。

或許，聯動思潮對朱成昭的影響更能說明問題。儘管在聯動炮打中央文革的「十一月黑風」中，朱也帶領三司抓過聯動。但聯動對中央文革一系列出爾反爾行為的公開炮打，對毛澤東的「左傾機會路線」，尤其是中共上層權力鬥爭黑暗面的公開揭露，卻都使朱「開始對這些老紅衛兵發生了好感」^⑬。1966年12月至1967年4月，朱開始和聯動頭頭周某某、丁某某、顧某某、彭某某等人密切來往。朱尤其欣賞作為聯動思想組織綱領的《秘字003通告》^⑭。在他們對文化革命的共同議論互相影響中，朱和他周圍的「一批人」（當然是三司或地院東方紅的造反派紅衛兵的頭頭們）的思想走的比聯動思潮還要遠得多，不僅對江青、陳伯達等文革集團成員在運動中翻雲覆雨、文過飾非的權術手腕有過淋漓盡致的揭露，甚至如他自己後來在檢

查中所說：「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無比崇高威望也發生了動搖……我開始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對中國的前途發生了懷疑。」^⑮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是決不會容忍造反派隊伍裏有這樣一個異端思想家的，朱成昭很快便被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並監禁了十餘年。

如果說從上述兩組歷史人物的思潮傳承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點甚麼，那麼有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固有高下深淺之分，亦有派別對立之爭，但優秀的異端思想者們卻少有凝固的門戶之見。頗具反諷性的是，他們在史無前例的狂熱中冷靜地汲取着對方「反革命思想」的精華，並使自己的異端思潮日趨成熟起來。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平心靜氣地探討一下聯動思潮以及被雲林先生稱為「正統派」或「新保守派」的異端思潮了。雲文竭力否認它們是異端，理由是「反文革的異端身份的確證，今日已不僅是事實判斷，更攸關道義價值而成為某種資本」^⑯。不錯，聯動思潮中的血統論部分並沒有甚麼正面的歷史價值，拙作中對它早已有過系統的批判^⑰。但把它列為文革中諸多異端思潮的一種，只是承認一種史實而無關歷史評價與「道義價值」。反之，聯動思潮中不少寶貴的思想——如對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文革如「斯大林時期大瘋狂」的批判，對中共上層權力鬥爭黑暗面的揭露，以及「取消一切專制制度」的吶喊等——卻不能因此連同洗澡水一起潑到垃圾堆裏去。尤其是由於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家庭背景，他們對中共上層黑暗面的公開揭發往往異常激烈並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一方面，這使他們當中終於殺出了魏京生這樣的徹底叛逆者；另一方面，由於這種揭露的挑戰性與公開

性，對於所有捲入文革的群眾，都有其心靈的震撼。如果認真地研究文革中異端思想者們和那一代青年的思想成熟過程，便會毋庸諱言地發現：對毛發動文革的實質——作為一種中共上層黑暗、骯髒、殘酷的權力鬥爭的認識，常常是他們醒悟的起點或共同點。

吉拉斯的《新階級》和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

如果說雲林先生在前面兩個問題上的偏誤主要出自派別立場而導致對文革異端思潮基本史實與進程的錯誤描述和判斷，那麼，當他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的「新階級」論相提並論時，他實在是犯下了一個重大的理論誤讀。雲文寫道^⑩：

「新階級」觀念將統治階級從「革命的無產階級」劃入「新型的剝削階級」。從而，這一理論根本上剝奪了當權者的權威合法性，而成為「正統」觀念最危險的「異端」敵人。這也就是權威意識形態體制下異端思潮的起源，因此，造反就是「新階級」觀念的繼續革命。

一言以蔽之，毛的「繼續革命」論所煽起的造反運動就是吉拉斯的「新階級」論的完美實踐。雲先生的這一基本立論實在是糊塗之見。吉拉斯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體系的一種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開宗明義地說明：「共產主義對於我是一種理想的幻滅」，造成這一幻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宗教性的」「暴政」和「原始與簡單化的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

主義的暴政，走向西方式的「民主社會主義」^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卻恰恰是要維護斯大林主義，建立一個比斯大林更為專制的中國式的封建法西斯的毛專制。

吉氏的「新階級」說把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都認定為「新階級」，因為他們實際上佔有了國家生產資料並剝削壓迫人民。這裏，吉氏依據的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按這一學說，斯大林—毛澤東本人才是這一新階級的總代表。與此相反，毛澤東從來不承認整個中共官僚集團都是「新階級」。他的「走資派」說首先劃分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兩個司令部；其次，又有所謂「兩條路線」之分。以他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然不在「走資派」之列。此外，毛氏的「黨內資產階級」完全按思想意識為劃分依據，這樣，毛和他的追隨者們便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他的政敵，他心懷不滿的人，以及黨內有自由化傾向的幹部打成「走資派」，進而將之清洗掉。而根據近年揭露的大量材料，毛澤東本人才是這一新階級中最腐化墮落、驕奢淫逸的共產君主。中共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王若水，曾發表過不少從純理論的角度批毛的文章。但最近他在仔細研究了毛對劉少奇等人的「繼續革命」的史實後，得出了這樣一個徹悟的結論^⑫：

並不是毛澤東先有「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理論」，然後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發動文革；相反，毛澤東是先要搞文革，然後發明出一套理論，來使這個行動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澤東誤以為劉少奇要搞資本主義，因此才要打倒他；而是毛澤東由於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打倒劉少奇，因此才給他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

當雲林先生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吉拉斯的「新階級」論相提並論時，他實在是犯下了一個重大的理論誤讀。理由是，吉拉斯的最終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義的暴政，走向西方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的，卻恰恰是要維護斯大林主義，建立一個比斯大林更為專制的中國式的封建法西斯的毛專制。

皮相看去，毛澤東想用群眾運動來消滅或限制走資派。但如上所述，毛氏的「走資派」概念其實是吉氏「新階級」論的一種理論偷換。雖然這種群眾運動在某程度上有利於異端思潮的孕生，但就其總體來說，常常淪為專制者建立新暴政的一種工具。與此截然相反，吉氏的《新階級》表現出對新階級的群眾性暴力深惡痛絕。雖然吉氏無法預料到數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書中借用陀斯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evsky) 筆下人物之口嘲諷過那些在「專制暴政」下追求「平等」、參與群眾性暴力的「奴隸」們^②：

在這一社會裏，……群眾都是奴隸並平等於他們的奴隸地位。但為了這一偉大的平等，他(們)甚至不惜擁護、誹謗和謀殺……奴隸必然是平等的，但這裏的自由和平等從沒有擺脫專制與暴政。

如果說上面的對比說明了毛澤東與吉拉斯的根本不同，那麼當雲林先生把「繼續革命」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異端」來論述時，足見其歧誤之大了。

註釋

①③⑦⑧⑩ 雲林：〈文革異端的判別標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號，頁64-70；67；64；64；66-67。

②⑨⑪⑫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13-14；237-40；274-99；20、24-25、30-32、77-82。

④ 王晨、張天來：〈劃破夜幕的隕星〉，《光明日報》(北京)，1980年9月21-22日。

⑤ 見牟志京：〈出身論與中學文革報〉，載楊建利主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Pleasant Hill：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1997)，頁174-75；陶洛誦：〈我和遇羅克一家〉，《中國之春》(紐約)，1988年7月，頁84。

⑥ 王希哲：《王希哲自傳：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1996)，頁127。

⑦ 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9-1967.10)》(洛陽：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兵團印，1968)，頁130。

⑧ 紅色游擊隊：〈從四個回合的鬥爭看兵團「新思潮」反動本質〉，《井岡山》(北京師範大學革命委員會主辦)，1968年4月10日。

⑨ 楊小凱：〈「中國向何處去」大字報始末〉，《中國之春》(紐約)，1990年12月號，頁66-69。

⑩ 朱成昭：〈我的檢查與交代(1967.8.15)〉(北京：地院東方紅公社大批判聯絡站印，1967)，頁3。

⑪ 據國內學者印紅標教授的考證，這一通告的作者似不是北京聯動成員而極可能為各省市的聯動成員。但這一通告仍是聯動思潮的思想綱領之一。

⑫ 同註⑩；並參見〈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反動思潮必須徹底批判〉，《紅鷹》(北京輕工業學院紅鷹兵團主辦)，1967年8月31日；以及地質東方紅紅色造反團，620革命造反兵團：〈再版朱成昭及其同伙反動言行的第一批材料〉，《內部參考》，第2期(北京：清華井岡山作戰部第四動態組，1967)，頁5。

⑬⑭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vi-vii; 146, 151, 163.

⑮ 王若水：〈毛澤東為甚麼要發動文革？——我的一些看法〉，《明報月刊》(香港)，1996年10月，頁30。

宋永毅 現任教於美國狄金森學院圖書館系